

· 元典文化丛书 ·

经国治民之典

《周礼》与中国文化

郝铁川 著



李振宏 主编 · 河南大学出版社

经国治民之典

——《周礼》与中国文化

郝铁川 著·河南大学出版社

(豫)新登字 09 号

元典文化丛书
经国治民之典
——《周礼》与中国文化
郝铁川 著
责任编辑 范振国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8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定价: 精装 11.80 元
平装 9.80 元

ISBN7-81041-193-4/K·163

元典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编 李振宏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宏斌	白本松	孙克强	何晓明
宋会群	李振宏	张曙光	郝铁川
高秀昌	崔大华	龚留柱	

序

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几百年间(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称“轴心时代”),南亚的印度人、西亚的希伯莱人、南欧的希腊人和东亚的中国人,在各自历经长时段的文明积淀之后,不约而同地达到文化史的一个临界点——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直观反映,而致力于对世界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探索,并思考作为实践与思维主体的人类在茫茫时空中的地位,开始形成深刻的而不是肤浅的、辩证的而不是刻板的关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学说,并首次用完整的典籍将其记载下来,从而使得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散漫的宗教、科学、文学、史学、哲学成就得以凝集、综汇和升华。这些第一次强有力地歌咏出诸文明民族“元精神”的为数有限的典籍,可以称之为“文化元典”^①。

如果说,《吠陀文献》和《佛典》是印度元典,《古圣书》是波斯元典,《理想国》、《形而上学》等先哲论著是希腊元典,《圣

^① 关于“文化元典”的界说,详见拙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

经》是犹太及基督教元典,那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首推《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被儒家尊为经典的《论语》、《孟子》、《荀子》,被道家及道教奉为经典的《老子》、《庄子》,被墨家视作圭臬的《墨子》,法家的集大成《韩非子》,都享有“元典”之尊。此外,一些专科创始之作,如军事鼻祖《孙子兵法》、医学宝典《黄帝内经》也可排入“元典”行列。

元典率先系统荟萃先民智慧,其思想富于原创性,其主题具有恒久性,因而元典有着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的超越性,它们的思考指向宇宙、社会、人生等普遍性问题,在回答这些普遍性问题时,所提供的并非实证性结论,而是哲理式原型;并非僵固式的教条,而是开放性的框架,有着广阔的“不确定域”,从而为历代阅读者和解释者保留了“具体化”和“重建”的无限空间,使之可以纵横驰骋,这便是所谓“《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春秋繁露·精华》),以至在两千余年间,元典常释常新。一部中华元典诠释史与整个中国文化史的进程相伴相依,互为表里。

历史的辩证法反复昭示:发展不是简单的生长和增进,它往往不一定呈直线式进步,而是通过一系列螺旋式圈层实现的。这样“回复”便不总是重复往昔,而可能是一种上升的形式,是“唤醒”事物在其开端时即已蕴蓄着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作为由具有自觉意识的人类创造的文化,也生动地展现着螺旋式的发展轨迹,如欧洲“文艺复兴”的崇尚古希腊、“宗教改革”的服膺《圣经》,便是对“元典精神”的发扬和再造,而欧洲文化正是在这种“回复”中赢得历史性进步的。这种向“文化元典”汲取灵感,获得前进基点的现象在中国也多次出现,著

名的“古文运动”便是典型事例。考之以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这种“返本开新”、“以复古为解放”,即回归元典精神以求新变的情形也俯拾即是。当然,现代化是一个文化转轨过程,充满变异与新生,现代生活好比一台巨大过滤器,对往昔文化传统或放行,或阻遏,于弃取间行扬抑之道。近世中国人立足于文明转型和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实践,选择中华元典精神里的变通哲学、忧患意识、华夷之辨、革命观念和民本思想,并与外来西学的相关部分彼此激荡交融,从而锻造出在近世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社会变易论、社会救亡论、民族国家论、社会革命论和民主主义。可见,元典精神的选择性发扬和创造性转换,是近现代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题旨,也是今人和后人所要反复探讨和力加实践的。

我从事元典研究多有年所,然困惑处不少,亟望友朋切磋。令人高兴的是,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元典文化丛书”,这使我顿觉良师益友在侧,其欢欣鼓舞自不待言。该丛书将先秦时期应运而生的一批文化元典逐部加以诠释,并阐扬其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及中国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影响,从而揭示今人精神之来源,民族文化之来龙去脉。这套丛书旨趣高远,而行文切实,为一雅俗共赏佳品。主事者今嘱余为之序,特撰上述,以谢盛意,并藉此就教于丛书作者和读者诸君。

冯天瑜

1994年8月21日于武昌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同寻常的年代。在这段长达数百年的历史转型过程中,中国历史不仅在政治、经济上经历着深刻的变迁,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此前处于萌芽状态的各种意识形态、哲学观念、历史意识、宗教神学、文化科学等,也都以成熟的形态凝聚、荟萃,涌现出一批文化元典,从而为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义域广阔的开放性基础。这些文化元典,诸如《诗》、《书》、《易》、《礼》、《春秋》、《论语》、《老子》等,包含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各种文化因子,历史地决定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方向,及其文化性质和特征。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成为今天人们所熟悉的面貌,中国国民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民族的特征,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以独特的历史道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是受惠于这批文化元典的历史奠基。

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又处在一个历史的转型期。传统

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必然要求以文化的变革为先导,为前提,同时也作为最终巩固经济、政治变革成果的牢固根基。然而,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变革,都不可能是对先前文化传统的革除和清洗,而恰恰相反,民族文化的每一次更新,都是原有文化传统精髓在更高层次上的发扬和转换,是将原有文化传统在其开端时已蕴涵着的文化义蕴在新形势下重新发现,重新唤起,并赋之以新的生命活力。唯有如此,文化才有更新,才有发展;唯有如此,文化也才有绵延不断的统绪,也才能为全体民族成员认同和承袭。大概正因为如此,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清理,从 80 年代以来,越来越成为引人注目的热点选题。

研究和清理民族文化传统,自然应将目光投向奠定了民族文化传统基础的文化元典,它们之中包含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族精神的范型。这一点,似乎不少文化学者都注意到了,因此,近年来出版了不少关于文化元典的通俗读本,白话、译作蔚为一时之盛。然而,民族文化的清理是一项严肃而艰巨的工作,通俗性的讲解和翻译,只是一个最必要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去深入挖掘诸文化元典的内在义蕴,特别是这些经典著作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国民性格的塑造,怎样起到了一种奠基性、支配性的作用,也都需要理个清楚;我们还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精神之来源,以及民族文化传统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从而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作出清醒的考察和历史的批判。但这种从历史角度考察文化元典的作用,进行文化精神寻根探源的艰巨工作,似乎还没有人做过。文化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使我们选择了编撰“元典文化丛书”这个课题,并为丛书确定了这样的宗旨:揭示文化元典著作的内在精神,并以主要篇幅阐述这

些元典著作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华民族性格的全方位历史影响,使广大读者能够在一本书中了解一种元典论著的深刻内涵,并将今天的民族精神与之联系起来,知道今人精神之来源,弄清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文化元典的历史价值,寻找文化创新的契合点。

“文化元典”是著名文化学者冯天瑜先生创制的概念。“元典”包含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及大典、善典、宝典等义蕴,亦即圣典、经典之义。文化元典之中应是蕴藏了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这样的典籍并不很多。然而,从民族文化整体去考察,有蕴涵其整体精神的元典之作,如传统的“五经”、“四书”即是;而就某一种文化领域来说,又有该领域的创始之作,如兵学有宝典《孙子兵法》,医学有首创之作《黄帝内经》,神话之源《山海经》,算学之宗《九章算术》,史学的范型《史记》等等。这种某一文化领域的创始作,自然也应填于元典之列。这样,我们这套丛书初选了三十种文化元典,分别考察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以期在五六年内陆续问世。

揭示文化元典的深刻内涵,并着重阐述其全方位的历史影响,并非易事,要有较深的研究工夫;再加上要面对普通读者,又需有将学术成果通俗化的能力。因此,这套丛书的编写,对著作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有一概略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应对以往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尽可能全面地认识元典著作的整体性、全方位的历史价值,并具备驾驭这些成果及将其融为一体的能力;应具备将学术成果准确而不失生动活泼地进行阐述的语言文字能力。然而,在具体写作中,在具体的学术观点上,每个作者又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他们可以对自己

著作的立意、结构和行文,进行创造性地构思和安排。因此,丛书的每一本著作,既是丛书整体中的一分子,又不失每位作者个人著作之特色。

现在,这套丛书开始出版了。作为一个文化人,当自身的使命感开始化作现实的时候,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喜悦。然而,我不能不说,这套丛书所以能面世,真正对它做出了贡献的是每一位作者,而为其付出了代价的则是出版者。在当前到处都在谈论经济效益的情况下,河南大学出版社欣然承担这套很可能要赔钱的大型丛书的出版工作,表现了他们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以及庄严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

65年前,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时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风雨如晦的年代,然而,却处于一个历史、文化的转型期,一个社会全方位变革的时期,清理古代文化,弄清未来的方向,也是一个极为迫切的任务,我们仍需要为祖国新文化的建设鸡鸣不已。愿我们的“元典文化丛书”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更新尽一点绵薄之力。

李振宏

1994年9月11日

目 录

序	冯天瑜(1)
“元典文化丛书”的说明	李振宏(5)
引子	(1)
一 一幅井然有序的政治蓝图	
——《周礼》的基本内容	(5)
1. 天官冢宰	(6)
2. 地官司徒	(10)
3. 春官宗伯	(14)
4. 夏官司马	(16)
5. 秋官司寇	(19)
6. 冬官司空	(21)
二 一桩聚讼未决的学术公案	
——《周礼》的成书年代	(23)
《周礼》源流	(23)
《周礼》成书年代的争议	(25)

- 3.《周礼》成书年代研究方法的差异 (29)

三 中国特色的“君主民本”式的政治结构

——《周礼》与中国政治文化 (32)

1. 内朝与外朝 (35)
2. 君主集权与大臣分权 (45)
3. 中央大一统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 (58)
4. 官吏考课制度 (66)
5. 弹劾与谏议 (78)
6. “六官”与六部 (90)
7. 基层组织与保甲制度 (92)
8. “以族得民”与政权、族权的合一 (98)

四 一张由情、理、法编织的法网

——《周礼》与中国法律文化 (105)

1. 富民、教民和刑罚相结合 (108)
2. 泛道德主义与泛刑主义相结合 (112)
3. 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 (115)
4. 官制法与行政法 (118)
5. “八议”和特权法 (122)
6. 直觉体验与坐堂问案 (127)
7. “三刺”与会审制度 (129)
8. “三宥”与慎刑 (132)
9. “三赦”与矜老恤幼 (133)
10. 正当防卫 (135)
11. 直诉制度 (138)
12. 血亲复仇 (139)

13. 人员编制的法制化.....	(141)
14. “刑三典”与刑法的“世轻世重”.....	(143)
五 一个权力经济的范本	
——《周礼》与中国经济文化	(148)
1. 土地王有制	(149)
2. 户籍管理与人身控制	(153)
3. 军事化的市场管理	(159)
4. 重农思想与农学研究	(167)
5. 利出一孔与官营工商	(169)
6. 轻视民营工商	(181)
7. 国富为本与经济改革	(183)
8. 中央集权与财政管理	(188)
六 结束语	(192)
附录一 《周礼》选译	(195)
天官冢宰第一(195) 地官司徒第二(213) 春官宗伯第三 (225) 夏官司马第四(234) 秋官司寇第五(252) 冬官 考工记第六(265)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67)
后记	(269)

引 子

历史曾是那样地慷慨,它曾把文明的种子播撒到世界各个地区,培育了 21 个文明奇葩(汤因比《历史研究》);但历史又是这样地无情,那些林林总总的文明硕果到了今天,有的消亡了,只留下几处废墟供人凭吊(如巴比伦文明);有的成为人们考古、发掘的对象(如玛雅文明);有的则突然中断,默默无言地沉睡了数个世纪(如古希腊文明和古印度文明)。惟有中国的文明薪火不断、绵延不绝,成为古代文明硕果中唯一的剩存、健在者。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迹,是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难解之谜。

为什么中国的古老文明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这一充满诱惑力的问号引起了无数中外史学家的关注,促使他们去进行探讨,并为此奉献了种种答案。这类答案概括而言,有如下数端:

经济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数千年来,人

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基本上是在单纯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这就使得中国社会长期沿着封建的轨道蹒跚前行了。

地理上，中国地处北温带，长城线以南的广大区域，是适宜于农耕的沃土，足以容纳众多的人口，进行农业生产。这片农业区域的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大海，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则依次横亘着茫茫的高原、沙漠以及昆仑、横断等一系列巍峨的山脉，它们犹如一道环形的天然屏障，拱卫着这一辽阔的农耕地域，阻挡着印度和世界古文明荟萃的欧亚内陆与中国的交通，使得中国的农业定居文明得以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自由发展。这一方面给中国大一统文明的产生与强化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另一方面也无可避免地赋予中国古老文明以巨大的惰性，延缓了它的发展、解体以至蜕变的过程。

政治上，数千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政权厉行“重农抑商”的超经济强制，使商品经济产生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市民阶层难以成长为独立的社会力量。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难以产生，中国社会只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地在封建生产关系上兜圈子。

文化上，忠、孝相结合的儒家意识形态抵制了宗教的侵袭，使得封建社会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逐渐内化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如果说欧洲基督教的“原罪”观念可以在逻辑上导引新兴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产生、从而在某种意义上引发了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与政治革命的话，那么数千年来，呻吟于封建专制淫威之下的中国人，则往往习惯于将自己的理想寄

托在所谓“圣明天子”身上。这也无形地延长了封建社会的运祚,使中国人在走出中世纪时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心理障碍。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合力”运动。因此,上述数端均含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我们是辩证法论者,坚持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因而在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合力中,必有一种主要的动力。那么,这个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地加以干预。你可以拥有多少田产、家业,你可以住什么样的房,坐什么样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戴什么样的帽子,以及以何种身份姿态去与社会各方面进行交往,都要看你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所处的级别、地位。因此,政治权力在古代社会是比任何有形的东西更值得追求的无价之宝,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而正是由于政治权力所占据的这种突出位置,以致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如土地运动、社会分配、阶级构成、思想文化,以及社会兴衰与动荡安定等等,实际上都与国家权力发生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可以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发展)的论断。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上层建筑,而这正是其它文明所缺乏的。

中国古代文明之所以具有一个比较完备的上层建筑,与